

“十七年”文学翻译批评的场域、路径与进程——以译家书信、日记为中心

操乐鹏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爬梳“十七年”(1949-1966)时期文学翻译批评的发生、路向与进程,于刊物言说空间之外,引入译家的书信和日记,可以打开另一类混沌、散逸的文学翻译批评场域。其中既蕴藏着诸译家的翻译诗学,且与公开的文学译场充满着错杂的张力关系。译家书信、日记中的文学翻译批评短小零散而不失灵动,亦不乏调侃、随意抑或冷嘲、偏激的一面,自有一股淋漓的生气和隐匿的译家心史贯注其内。这都昭显出“十七年”文学翻译批评的殊异路径、驳杂涵容与复调进程。

关键词:文学翻译批评;书信;日记;场域;“十七年”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2021)04-0026-08

爬梳“十七年”间文学翻译批评的发生、路向与进程,刊物构成了其中至为关键的言说空间。新中国伊始,京沪两地的翻译刊物《翻译月刊》和《翻译通报》便对共和国的翻译事业进行定调与定向(赵稀方,2015)。《翻译月刊》作为综合性刊物,以刊发译文为主,并不专登文学译品,却也偶或涉猎文学翻译批评^①。相较之下,《翻译通报》载有大量的翻译批评文章,涉及从文史到政论等各领域的翻译议题。具体到文学翻译,既有直接探讨翻译理论与批评的文章,也有对文学译品的鉴赏、评论之作。除了《翻译月刊》、《翻译通报》这两份官方性质的翻译刊物,共和国初期尚有私营的《亦报》场域,其中如周作人的多篇随笔散记,亦触及文学翻译批评议题^②。

《翻译月刊》于1951年停刊。创刊于1950年7月的《翻译通报》于1952年8月休刊。1953年复刊后,《翻译通报》转变为专门公布翻译计划、交流翻译情况的内部刊物,取消了原有的翻译理论、译本评介、翻译学习

等专栏^③。此后,“谈翻译理论和方法,评介译品的文章”几乎没有出路(袁可嘉,1957:15)。直至1957年《文艺报》开设“让文学翻译的花朵怒放吧”的专栏,先后发表老舍、傅雷、潘家洵等人的翻译批评,形成了自《翻译通报》后的第二次文学翻译批评热潮。此外,尚有部分语言教学与研究类期刊如《西语语文》、《中国语文》等,间或刊发翻译批评。

以文学翻译批评的论述对象及阐释取径考量之,前述文学翻译批评约略可分为四类:其一是学理性文学翻译批评,往往依托于厚实的翻译理论和广博的翻译史视野,阐说翻译语言、文体、风格、重译、直译、硬译等议题。其二是实用性文学翻译批评,即聚焦具体而微的文学翻译技巧。《翻译通报》上的大批文学翻译批评文章都从原文与译文的比勘切入,正是这类批评操作模式。然而,多数译评溺于单纯的指谬、纠错,更有少数批评文章质量低劣,难怪被讥为“只翻了几页书就乱评一通”(冯鍾璉,1957:15)。其三

是译场建设类文学翻译批评，多触及当代文化机制和出版体制，囊括了文学翻译的出版、发行、稿费、校对等话题。“百花”时节《文艺报》上的翻译批评就为共和国的文学翻译事业建言献策，也捎带着翻译家的牢骚、不满，可视为此种批评的代表。其四是政治性文学翻译批评，以政治性因素的介入程度和尺度的不同，有着各异的呈现。

在刊物场域内综观“十七年”间的文学翻译批评，其于新中国初期和1950年代中期产生两次高潮，分别以实用性翻译批评和译场建设类翻译批评为大宗，但学理性均逐渐稀释乃至丧失。两次热潮以外，文学翻译批判不外是不温不火的零敲碎打，散见于不同的报刊。假如不囿于当代刊物场域，继而引入译家的书信和日记，则可以打开一个隐匿散逸又充满混沌和复调的文学翻译批评场域。它的私密性、个人性，与公开的文学译场充满着错杂的张力关系，既有译家的主动迎合或冥契，更有敏感的犹疑、应激式的翻案甚或抵牾。职是，下文以叶圣陶、傅雷、李劫人、巴金、萧珊、吴兴华等译家的书信或日记为切入口，聚焦文学翻译批评在私语空间与公共场域之间的互动与勾连、交锋与并峙，勘探译家书信、日记中所蕴藏的文学翻译观，揭橥当代文学翻译批评的殊异路径与驳杂涵容。

一、显隐之间：译家书信、日记对公共场域文学译介的评说

共和国初年的文学翻译批评以《翻译通报》为中心，汇聚起众多翻译家及其批评文章。即便没在《翻译通报》上露面的译家，也多会主动地密切关注着《翻译通报》的动态，而《翻译通报》的某些作者，时或在自

家日记、书信中，流露出另类的观感与态度。

1952年，帮助平明出版社译稿、组稿的萧珊致信巴金，提及曹未风所译的《汉姆莱特》第一部将由巫宁坤校阅，而“最近一期翻译通报对曹前译的莎翁全集有不好的评价”，“我以为不完美宁可不出。第一出版界会对他有成见的。要达到完美，太难”（李小林，1994：82-83）。半个月后，巫宁坤对曹译莎剧的评价是：“散文部分还好，韵文部分生硬，而且错处较多，改起来相当麻烦，当然谈不到‘风格’。”（同上：85）所谓对曹译莎翁有不好评价的那期《翻译通报》，当是《翻译通报》第三卷第五期。该期“推荐与批评”专栏收有顾绶昌《评莎剧“哈姆雷特”的三种译本》一文，围绕梁实秋、朱生豪、曹未风三人的译本展开讨论。顾将原文与三种译文分别比勘，相较之下，“曹译文字生硬，语病和错误最多，漏译的地方也不算少，并且译文未附加任何注解，所用的参考书也似最少，工作因此做得最潦草”（顾绶昌，1951：54）。对于《翻译通报》的批评意见，萧珊、巴金可以说都是非常在意。作为校阅者的巫宁坤对曹译的看法与顾绶昌基本相同，而惋惜“谈不到‘风格’”，可看出巫宁坤对翻译风格的重视。

萧珊1952年6月提到的《翻译通报》第三卷第五期，其实已不是所谓“《翻译通报》最近一期”。而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可谓即时同步地阅览《翻译通报》，掌握翻译动态。1951年5月15日叶圣陶日记载，观新出之《翻译通报》“谈翻译史，遂有多人论及佛经翻译之佳绩。颇有人属望于我署，谓当开大规模之译场。”（叶圣陶，2018：1240）此处的新出《翻译通报》为第二卷第五期，出版日期正是叶氏该条日记的日期。该期为“红五

月特大号”，辟有“中国翻译史特辑”，刊发了叶恭绰《由旧日译述佛经的情况想到今天的翻译工作》、苏晋仁《佛经译场的发展》、余文《古代的翻译机构和翻译方法》、漆侠《宋代的佛经翻译》等梳理古代佛经翻译史的文章。然而，对于众人热烈呼吁的借鉴与吸收佛经译场经验，叶圣陶颇为冷静，并不乐观，直陈“此非目前所能办也”（同上）。1952年，叶圣陶日记有言：“下午看新出之《翻译通报》。通报中多载批评、检讨文字，盖翻译界受三反影响之表现。有数篇指摘极端荒唐之译品，竟不成其为语言，观之生恨。”（同上：1345）该处的《翻译通报》为1952年五月号，设有“三反运动中翻译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包括方今《这是不是大量抄袭？（谈铁弦译“恐惧与无畏”）》、桂江《评禾金译“暴风雨所诞生的”》、何如等《评梅溪译“高尔基选集”》、孔柯嘉《三反运动挽救了我》的翻译批评和翻译家自我批评的文章。对文学语言极度敏感的叶圣陶看到竟有译品如此荒唐低劣，也难免会“观之生恨”了。

另如傅雷，他埋头于译业，一直拒绝为《翻译通报》写稿，“三年前北京《翻译通报》几次要我写文章，我都拒绝了，原因即是空谈理论是没用的，主要是自己动手”（傅雷，2016a：74）。但是，傅雷也不是不关注《翻译通报》。1954年，傅雷致宋淇信中说及的“赵少侯前年评我译的《高老头》”（傅雷，2016b：211），就是赵发表于《翻译通报》1952年七月号上的《评傅雷译“高老头”》。赵文认为，傅译在追求“神似”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形似”上也“还是符合于，至少是接近于原文的”（赵少侯，1952：13）。同时，赵文不讳言傅雷调整分句关系、改变原文词性等手段会损害译文的忠实性，也并不

赞成傅雷在译文中对旧小说笔法、腔调的蹈袭。傅雷还曾转引钱钟书的“报道”：“燕京有一狂生，未识面，为蒋天佐《匹克威克》校出错误三千余条，写成稿纸四百页寄《翻译通报》，以‘态度不好’退回。”（傅雷，2016b：199）这里的“狂生”，应是吴兴华。这位狂生四百多页的翻译批评稿被退回，可见《翻译通报》尽管主张客观的译评，或因迁就于人际关系，容纳各类文章的气度和格局仍显局促和扭捏。

对于1951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和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诸译家在日记、书信中，多持冷峻旁观的态度，各家“译”见之分歧往往大于共识。吴兴华就说，“全国翻译会议事已寂然无闻，大概又要延期。据知内幕者说其中困难重重，一班译书匠标准太低，常识尤差”（吴兴华，2017：226）。沈志远在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作了《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而叶圣陶不满于沈志远报告的“意颇平凡，文尤芜杂”，遂“略提意见”（叶圣陶，2018：1283-1284）。由叶蠖生代为起草的翻译会议闭幕讲话，叶氏也指责其“草率殊甚，既须刊登，非改不可”（同上：1290）。在翻译会议的分组讨论中，叶圣陶更为关注切实可行的策略措施，而对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谈并不感冒。其日记有如是录载：“张锡俦君谈苏联翻译界情况，较空疏。樊以楠女士谈人民大学译员之培养，及其校译稿之审读制度，颇为切实。”（同上：1286）

1954年8月，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分别由茅盾作《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郭沫若作《谈文学翻译工作》的讲话，周扬作总结发言。傅雷虽未与会，却对周扬的发言表

示异议：“八月十六日到二十五日，北京举行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周扬作总结时说（必姨参加了，讲给我听的）：技术一边倒。哪有这话？几曾听说有英国化学法国化学的？只要是先进经验，苏联的要学，别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也要学。据说这种说法在华东是听不到的。”（傅雷，2016a：73）“必姨”即杨必，傅雷曾指点其翻译。在向苏联一边倒的翻译格局中，傅雷的发声，也只能停留在书信内。倒是吴兴华的看法与傅雷隐隐呼应：“解放到现在，没有人敢对欧洲文学作一篇——一篇——系统的估价介绍。前些日子开会遇到卞之琳，每讨论译一本书就要问马克思是否提到过它，有保障没有？令人哭笑不得。”（吴兴华，2017：224）

二、独语与对话：译家日记、书信内蕴的文学翻译批评观

不单单对公共场域的翻译刊物或译事发语评说，译家的书信、日记同样构成了文学翻译批评的自足空间，且多沿袭译家本人一贯的翻译追索，时时呈现与当代文学翻译语境“隔”的状态。对于建国初期文学翻译的整体状况和译业水平，译家们私下的直言不讳异于会议报告式的过度乐观。1950年代初，吴兴华为出版社审查译稿，“看此地翻译人才及过去译本太坏太坏”，“近来我们也许要看些译本（官方的名目是‘审查’），文字通顺的十无三四，更不用谈忠实准确了”（同上：219）。这种状况使得吴兴华兴味索然，“我现在对绝大多数的译本和现代创作已抱定抵制态度——根本不看”（同上：226-227）。对于一些并无过硬语言能力的译者将文学翻译作为投机经营，傅雷深觉不屑，“时下的译者十分

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本身原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得些皮毛，对文字只懂得表面”，“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的，也在译书！或者是想借此弄几个钱，或者想‘脱离原岗位’，改行靠此吃饭”（傅雷，2016b：209-211）。

译家书信、日记中最精彩的部分自然是介乎学理性翻译批评与实用性翻译批评之间的译评。其中，多有简单化的随口一提，如冯亦代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禁不住感叹道“小说写得真美妙，高植的译文也不错”（冯亦代，2000：219）；郑振铎看完了《斑麋》，评曰“写得不错，译笔也流畅”（郑振铎，2005：164）。另一方面，译家有意为之的品评，便更具翻译诗学的底蕴。这里既有以书信往还连缀起的译家群落在翻译批评上的对话，也有借日记发声的独白与心语。

围绕着平明出版社的翻译出版，巴金、萧珊、巫宁坤、卞之琳、穆旦等译家在书信中多有交流译作与译校事。上文提及的巫宁坤评说曹译莎翁即为一例。萧珊还请卞之琳审读查良铮译的《波尔塔瓦》，“他觉得比得过一般译诗，那末就够了，我想再寄回去给查改一下”（李小林，1994：140）。巴金尽管身在朝鲜，也不忘平明的出版事宜，既肯定傅雷的译文，又对译名有所商榷：“采臣寄来的书大半都看过了”，“梅里美的东西不错。傅雷译文还可以，但把作者姓名译作‘梅里曼’，我颇不赞成，因为嘉尔‘曼’和梅里‘曼’在原文里是两个不同的拼音”（同上：151）。

傅雷、钱钟书、杨绛、吴兴华、宋淇等人则组成了经常交流译事的又一群落。

傅雷在书信中常对董秋斯、周煦良、赵少侯等人的译作表示不满，如评价董秋斯所

都别扭”(傅雷, 2016b: 195); 认为赵少侯所译《海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 而且许许多多篇幅, 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同上: 211)。而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 “闻杨译经锺书参加意见极多, 惟锺书‘语语求其破俗’, 亦未免矫枉过正”(同上: 206)。傅雷对此种“破俗”的译法也保留意见。对别人的翻译要求严苛, 傅雷对自己也丝毫不懈怠, “我自己愈来愈觉得肠子枯索已极, 文句都有些公式化, 色彩不够变化, 用字也不够广”, “觉得风格难以传达, 畏缩得很”(傅雷, 2016a: 36), 译文的句式、语体、风格始终折磨着傅雷。吴兴华也是在书信中独抒己见, 尝试对各家译品作出确切的评说。众口称赞的朱生豪未必能使吴氏折服, “现在正在‘审查’过去一些旧译本, 我们担任莎翁。看到一本众口交赞的朱生豪译的莎翁戏曲, 朱氏为一年青学生, 有此毅力, 自可佩服, 后来死了没有译完。序中旁人把他捧得‘一佛出世’, 甚为可笑。我想若给我们功夫, 译得比他一定要好, 至少文字要通得多”(吴兴华, 2017: 221)。而傅雷译作着实让吴兴华心悦诚服。傅雷译《贝姨》“的确非常好, 在目前译书界可以说是见了令人‘心眼俱明’的好书”, 其他翻译巴尔扎克的译者“功夫和文章都远不如傅雷, 他实在应该继续努力多译”(同上: 226-227)。

1956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萧伯纳戏剧集》, 收有老舍译《苹果车》和朱光潜译《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出版前, 出版社曾让老舍和朱光潜互为审读译稿。二人的通信及其探讨、切磋所体现出的温润之风, 也在当代文学翻译批评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徐德明, 2009) 1955年9月26日,

老舍致信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 “光潜译笔甚确, 全文无大错误。”(老舍, 1999: 752) 同日, 老舍致朱光潜信: “我细细读了您的译本, 译得好极!” “恕我吹毛求疵: 我觉得译笔枝冗了些——我知道这是为了通俗易懂, 但有时即流于琐碎无力。好不好再稍紧缩一些呢? 特别在原文非常俏皮的地方, 似乎不宜只顾通俗而把俏皮变为笨拙”(同上: 753)。擅长话剧创作的老舍希望朱氏译笔能再活泼有力些, 也探讨了一些具体的翻译问题, 如朱光潜把原文“进来润润咱们的交易”译为“进来咱们喝一杯, 把交易说定”, 老舍觉得“您译得不错, 但失去原文的风趣”; “以老爷代sir 嫌别扭一点, 可我也没有更好的主意”; “神父与牧师似须分开, 不宜相混”(同上: 753-754)。朱光潜于1955年10月致信老舍, 谈论《苹果车》的翻译: “第一, 你没有尽量利用你所特别擅长的中文口语, 本来是个打枪的能手, 现在却要耍大刀, 这就不一定能操必胜之权; 其次, 你在读者群众中威信和影响都很大, 从你手里出来的文字, 无论是自己作的还是译的, 都是许多青年学习的对象; 我们现正在争取汉语的规范化, 说到究竟, 真正促成语文规范化的还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作家, 你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朱光潜, 1993: 38-39) 朱光潜不太赞同老舍的直译, 同时提醒老舍注意汉语的规范化, 正与老舍对沉冗笨拙译笔的反拨相对; 二人在翻译准则上有着微妙的差异。

应当说, 到了日记中, 翻译家们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时代“共名”的压力, 也较少人际关系上的顾忌, 大可直白地从自家的翻译观出发作出评说。如叶圣陶“看新到之《人民文学》, 中有介泉所译英国小说一篇, 其译笔深可佩服如此译笔国内甚少。一般译

品,皆仅能知晓其事,未能领其味也”(叶圣陶,2018:1556)。叶圣陶赞许介泉(即潘家洵)的译文,对一般译品忧心忡忡;甚至楼适夷的译文,在叶圣陶看来,亦是问题多多。1954年,叶圣陶曾为楼适夷校阅《蟹工船》,“看适夷所译《蟹工船》。译笔颇有问题,少数部分可为改动,大部分余无能为力,即书之于纸,俟适夷自己解决。小林多喜二之作同于粗线条之绘画,描写海洋甚有出色处。”毕生致力于语文教育的叶氏,对译文语言尤其看重,“竟日看适夷之译稿,仅得六十余页。此译之病在词汇枯燥,语言单调。欲求其精,唯有另起炉灶重译耳”(同上:1574-1575)。李劫人在建国后忙于修改小说《大波》,无暇从译,却也在书信中留下了有关翻译批评的见解。在致谢扬青信中,李劫人论及翻译语言的取向:“再就译文而言,吾宁取鲁迅之生涩,而傅东华之过份熟练,则无可取;苟一味中化,文言何若林纾?语体何若伍光建?油头粉面以取悦于世俗,非文学士宜为也。”(李劫人,2011:139)在追求译文大众化的“十七年”语境中,一仍希冀取法鲁迅的硬译及“生涩”的风格,确乎需要几分定力和坚韧。

三、文风、姿态与心史:译家书信、日记中的文学翻译批评特质及价值

打捞译家书信、日记中的文学翻译批评,寻绎多种湮没的声音,可以丰富译家、译事、译业的多维面向,打破当代文学翻译史的既定成见与成规,重构“十七年”文学翻译与批评的复调进程。且看叶圣陶写于1953年8月9日的日记片段:

晨间开始看《牛虻》,此系英国女小说家(叶圣陶,2018:1556)之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卓娅(叶圣陶,2018:1556)并称此书,又见高尔基亦加赞赏,乃投函各方面,希望译印行,余处亦收到投函。余与雪峰商之,雪峰云待觅原本。而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得之,即托人译。因闻余言此类书既必风行,不第影响青年之思想,亦复影响青年之语言,译事不可草率,遂屡改译稿,审校再三,延至今日方出版。(叶圣陶,2018:1475)

引文述及《牛虻》的出版问世过程:读者强烈的阅读需求(“乃投函各方面,希望译印行”)——人民文学出版社寻找《牛虻》的原本(“雪峰云待觅原本”)——中国青年出版社捷足先登,抢先译出(“中国青年出版社先得之,即托人译”)。叶圣陶的这则日记不啻为1950年代初外国文学翻译及出版界的状况留下了珍贵侧影:出版业至少在1953年尚未形成完善紧密的分工合作,各出版社之间依旧存有抢译的竞争行为。选择哪些外国文学进行翻译,有时并不是出版社的主动出击,读者的阅读渴望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绝大多数对《牛虻》译介与接受的研究,大都以译者李俚民的叙述为准,只看到《牛虻》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先出版的既成史实,《牛虻》出版的“史前史”也就被遗弃在历史尘埃中。在《牛虻》的译介批评和研究中引入叶圣陶日记的叙说,可“以此了解包含在此一事件背后的人、事背景,并通过对同一事件,不同人、不同时间的相似或相异的叙述,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以增进我们对历史情境的了解”(洪子诚,2012:5)。

论者常以中国青年出版社是由共青团领导、以全国青年为主要读者群的出版社为根据^①,进而指出这部契合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牛虻》是被出版社精心打造成的提供精神食粮的青年读物(倪秀华,2005;卢玉珍,2005)。将《牛虻》此后引起的热烈反响

和经典化进程追认为出版社的动机,把行为结果错置为行为动因。《牛虻》并非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精心”塑造,而是“成心”抢译的结果。亦有研究者从赞助人等理论范畴出发,认定1950年代“文学翻译的‘赞助’系统完全统一到国家手中”,文学翻译已经“上升到国家行为层次,并且完全体制化”(朱安博,2008:265)。考之以出版社间对《牛虻》的竞争行为,可知这样的论断当非实情。以西方翻译理论的辔头驾驭、操控中国文学翻译之史实与史识,用“理论试图取代具体处境中的解释技艺和理解力”(特雷西,1998:15),带来的只会是似是而非的结论。

除了《牛虻》的译介问题,叶圣陶的这段日记还透露出许多信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读者中广受欢迎,以至于青年们爱屋及乌(“见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卓娅皆盛称此书”);读者对文学的阅读和评判以俄苏文学的权威论述为标准(“又见高尔基亦加赞赏”);叶圣陶对译本语言和语文教育的看重(“亦复影响青年之语言,译事不可草率”),与多在意识形态和出版利润上考量的出版社拉开了距离。是类日记、书信中的译事“断片”,往往涉及译家的翻译动机、出版社的翻译计划、译本版本等重要关目,诸如茅盾为罗念生向戈宝权寻找希腊悲剧的俄译本(茅盾,1997:308)、冰心书信中的赶译泰戈尔事、叶圣陶劝潘家洵续译易卜生……均可为当代译史作补阙之用。

就译家书信、日记场域中的文学翻译批评本身的特质来看:其虽短小零散而不失灵动,时或平白如话,时或言谈微中;少数译论的段落和语调,亦近乎“酷评”,不乏调侃、随意抑或冷嘲、偏激的一面;相较于刊物场域中摆开架势、引经据典、自然大都引

马列主义之“经”,据斯大林语言学之“典”)乃至剑拔弩张的翻译批评文章,自有一股淋漓的生气和译家主体性贯注其中。吴兴华初读孙大雨所译《李尔王》,觉得也很好,“只有在序言中不断的自吹自擂,而且以一些鸳鸯蝴蝶的形容词唐突莎士比亚,则有些‘措大习气’”(吴兴华,2017:227)。然而一个月后,吴兴华便改口:“孙大雨译本已大略看完,的确是国内莎氏译本第一,毫无问题。我忘掉上次信里有甚么‘苛求’的话。他的序文有些不必要的吹擂,则是事实”(同上:230)。吴兴华之狂之率直,跃然纸上。傅雷和钱钟书都是眼界极高,心高气傲,一般的译作很难入其法眼,遑论误译错译满纸的译品。怒庵先生的翻译批评是金刚怒目式的痛诋,钱钟书尝以一不间断的比喻长句“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傅雷,2016b:204),戏拟、嘲弄叶君健译文的死板与冗长,倒也贴合钱氏造语一贯的机锋与刻薄。译家日记、书信中翻译批评的文风与姿态,正自兹而显。

四、结语

综合来看,尽管可以将私语场域与刊物场域两相比照,可事实上,译家书信、日记中的文学翻译批评,不过是历史主潮下的潜流罢了。对于当代译坛,傅雷、钱钟书们自居边缘,有着冷眼旁观的清醒和我行我素的执着。正像傅雷自比的“墙洞里的小老鼠”,“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神的‘洞穴’,只有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金圣华,2006:12)。书信、日记场域之于翻译家,也就好比这借以存身的“洞穴”,在历史的规律化、条

理化进程中,“这些散漫、纷杂的细节会被简化,‘提纯’,在‘规律’提取、‘经典’次序排定的筛网中过滤掉”,正统的文学史抑或翻译文学史“没有容纳这些细节的空间,也不具备处理这些细节的能力”。而“‘质感’的,‘细节化’叙述,有助于凸现历史的‘现场感’,呈现被抽象概括遗漏、遮蔽的情景,包括具体的思绪、情感、氛围等因素”(洪子诚,2005:124)。叶圣陶、傅雷、吴兴华等人“背地里”在翻译批评上的论说与耕耘,以及其处境与心态,假如不投向书信、日记等史料,其

实是很难呈现于文学翻译研究中的。

“历史的遮蔽和涂饰的主要表现,就是观念、意识形态的遮蔽所导致的历史事实的遮蔽。因此,如果我们想冲破重重涂饰‘示人本相’,就必须从被遮蔽、掩埋的历史史实的重新发掘开始”(钱理群,2004:88)。故而,在公共性刊物场域而外,当代文学翻译批评研究需要重视和引入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私人话语性质的史料,以靠近与触摸历史现场,检视其中的翻译批评、翻译诗学乃至译家精神生命的投影。

注释

- ① 这类译评有《翻译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的《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第三卷第四期的《关于翻译的批评与讨论》等。
- ② 周作人在《亦报》上发表的翻译批评有《谈翻译》、《重译书》、《名从主人》等。张泉界定“《亦报》场域”为建国初上海以《亦报》、《大报》民办小报为中心的场域,它“为初创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新中国文学话语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另一个类别的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参见张泉:《文学“统战”与当代文学在新中国的重建——以《亦报》场域中的“沦陷区三家”梅娘、周作人、张爱玲为例》,《学术月刊》2018年第4期,第99页)。对于“《亦报》场域”的界定,本文沿用之,借以呈现新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多层样貌。
- ③ 新刊中《编者的话》对刊物定位及栏目设置的调整变化有说明,见《翻译通报》新一期,1953年6月15日,第2页。
- ④ 1953年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牛虻》版权页“出版者”处,尚标注“青年·开明联合组织”(参见伏尼契:《牛虻》,李假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权页)。有论者认为中青社是“直属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倪秀华,2005:120),或以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月(卢玉玲:《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地图的重塑——“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研究》,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7页),均有误。

参考文献

- [1] 冯亦代. 梅余日记[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2] 冯鍾璞. 打开通向世界文学的大门[N]. 文艺报, 1957-6-23: 14-15.
- [3] 傅雷. 傅雷文集·家书卷(上)[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a.
- [4] 傅雷. 傅雷文集·书信卷[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b.
- [5] 顾绶昌. 评莎剧《哈姆雷特》的三种译本[J]. 翻译通报, 1951(5): 54-58.
- [6] 洪子诚. 当代诗歌史的书写问题——以《持灯的使者》、《沉沦的圣殿》为例[J]. 郑州大学学报, 2005(5): 123-127.
- [7] 洪子诚. 材料和注释: 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J]. 文学评论, 2012(6): 5-21.
- [8] 金圣华编. 江声浩荡话傅雷[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6.
- [9] 老舍. 老舍全集(15)[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 [10] 李劫人. 李劫人全集(10)[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 [11] 李小林编. 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
- [12] 卢玉玲. 不只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也谈《牛虻》的经典之路[J]. 中国比较文学, 2005(3): 181-193.
- [13] 茅盾. 茅盾全集(36)[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14] 倪秀华. 翻译: 一种文化政治行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译介《牛虻》之现象透析[J]. 中国比较文学, 2005(1): 116-131.
- [15] 钱理群. 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3): 82-91.
- [16] 特雷西. 诠释学·宗教·希望[M]. 冯川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17] 吴兴华. 风吹在水上: 致宋淇书信集[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18] 徐德明. 老舍译事[J]. 博览群书, 2009(3): 15-18.
- [19] 叶圣陶. 叶圣陶日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20] 袁可嘉. 翻译与研究分不得家[N]. 文艺报, 1957-6-16: 15.
- [21] 赵少侯. 评傅雷译“高老头”[J]. 翻译通报, 1952(7): 11-13.
- [22] 赵稀方. 思想改造与翻译转型[J]. 中国翻译, 2015(1): 35-39.
- [23] 郑振铎. 最后十年[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5.
- [24] 朱安博. 翻译文学的重构与新生——《牛虻》的经典之路[J]. 社会科学战线, 2008(2): 264-266.
- [25]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10)[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as a Concept and a Research Topic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By *REN Wen & LI Juanju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5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no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NLC)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 Translation Practice (NTP),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 (NTC)” be accepted as a new concep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goes on to define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he way these elements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within its conceptual framework. By NTC we refer to the total capacity of a country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translation-related laws, policies and plans, to carry out projects of translation, to ensure communicative efficacy of translation products, and to mobilize resources for a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uch a capacity consists in four interrelated and mutually influencing sub-capacities, respectively those for the management, the practice, the recep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Each of these sub-capacities is further analyzable into a number of even more specific capacities. Thus conceptualized, NTC holds the promise of broadening the core content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increasing its interdisciplinary dimensions. And it casts more light on the crucial roles translation plays in enhancing a country’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economic hard power, in protecting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our world, and in building up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 whole.

Keywords: NLC; NTC; concept; construct; significance

Translators’ Correspondence and Diaries as an Alternative Source for Studying China’s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from 1949 to 1966

By *CAO Lepe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China) p.26

Abstract: Turning attention from formally published treatises to informally exchanged comments made in translators’ correspondence and diaries opens up a less than orderly and yet richly informative vista for grasping China’s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1949 to 1966. In those short, lively and often fragmented comments, one gets a sharp sense not only of the translation-related poetics personally subscribed to by those concerned, but also their ambivalent and sometimes tension-fill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What those alternative source materials reveal is a scen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during the first 17 years in PRC’s history that was more diverse and polyphonic than it has been perceived so far.

Key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letter; diary; field; “the seventeen years”

William C. Burns’s Chinese Rendition of *The Peep of Day*: A Site for Cross-stylistic, Cross-cultural and Cross-religious Dialogues

By *LI Zhe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China) p.34

Abstract: *The Peep of Day*, a collection of Gospel stories for children by Favell L. Mortimer, has been translated in modern times into nine different Chinese versions by six China-based missionaries. Among these versions, William C. Burns’s has received an especially wide circulation. Burns’s translation is noted for its adaptation of the source text’s original readership, style, language and content to local conditions of the target culture, including the stylistic norms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literary field then taking shape in China. To induce a “fusion of horizons” among his target readers, he even underwent to add many localized details to his Chinese version. As such, Burns’s translation becomes in effect a site for cross-stylistic, cross-cultural and cross-religious dialogues.

Keywords: *The Peep of Day*; William C. Burns; Christianity; style; dialogue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